

“草堂栖在灵山谷，勤读诗书向灯烛。  
柴门半掩寂无人，惟有白云相伴宿。  
春日溪头垂钓归，花笑莺啼芳草绿。  
猿鹤寥寥愁转深，携琴独理仙家曲。  
曲中哀怨谁知妙？家贫耽学入争笑。  
君不见苏秦与韩信，独步谁知是英俊？  
一朝得遇圣明君，腰间各佩黄金印。  
男儿立志需稽古，莫厌灯前读书苦。  
自古公侯未遇时，萧条长闭山中户。”

全诗见于福安《高岑三廉薛氏宗谱》中。但清康熙四十四年(1705)，收录到《全唐诗》卷215时，仅存前面的四句，题目叫《灵岩寺》。究竟是匆促漏收还是删略之故，不得而知。

在《宗谱》中，还同时录存令之的另三首诗作：

《唐明皇命吟崛轶草》、《游太姥山》、《送陈朝散诗》。

崇祯、乾隆和光绪版《福安县志》皆收录，而《全唐诗》则未收。令之著的《明月先生集》、《补阙集》各一卷今亦失传。

令之还是一位廉洁刚直的官员。中进士后的令之，供职到玄宗开元初，便被升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（或作侍读，《唐摭言》、《稗史汇编》均作左庶子），与贺知章同侍皇太子李亨，为其讲授经史。左补阙一职是唐代中央最高级政务机构之一的门下省（宰相）属下的官员，级别为从七品上，有直接对皇帝进行规谏和举荐人

才的职权，位极清要，颇为时人所重。开元后期，唐玄宗渐变成一个荒怠政事，沉湎淫乐的皇帝，并宠用奸诈诡譎、人称“口蜜腹剑”的李林甫为相，致使朝政日非，腐败不振，而李相又与皇太子李亨不睦，矛盾甚深，东宫官员也受到排挤冷落，生活清苦。时令之凭借补阙身份，在宫壁上题诗“自悼”，实则对皇帝进行讽谏，由此得罪了玄宗，不得不“告老还乡”。事后玄宗觉得过分，又得知令之返里后家境贫困，便诏令以长溪县岁赋资助令之使用，而令之则体谅到人民疾苦，只酌量受之，不肯多取。直至公元756年，皇太子李亨继位（肃宗），念及过去东宫教诲恩德，下诏令之回朝重用，可惜令之已故，李亨惋惜不已，又闻令之量受岁赋之事，更为感动，嘉叹其廉洁高风，便下诏封令之的家乡为“廉村”，家乡的溪流为“廉溪”，以表彰其廉洁刚直。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现在。

令之歿世之后，在其故里和周围的村落，如城山、凤林、黄澜以及城关的金山、三会堂街（南门）等处，皆建造祠庙，最有名者是“三贤祠”（祀薛令之、谢翱、郑虎臣）；令之未仕读书的“灵谷草堂”，虽在其逝世几十年后的咸通元年（公元860年）改建灵岩寺，但亦“别署一地建祠于其旁以祀公”。其祠庙之多，在当地诸先贤中首屈一指，历代歆享不绝。明福安知县孟充（高安人）有《题薛补阙祠诗》：“松桂庭台苜蓿盘，先生岂是厌清寒？牡鸡欲唱前星暗，归去廉溪且挂冠。”；清福宁知府李拔来福安谒祠时，亦留下“公余谒补阙，祠



水一潭清，景仰高风在，相知对月明。”的诗句。福安阳尾过溪通往溪潭乡马山、溪北、城山等村的一条山岭，因令之之名，改称为“廉岭”、“廉山”；岭巅有唐代遗存的古树一株，“百尺无枝，霜皮溜雨”，也被命名为“廉岭孤树”，列入韩阳十景。足见后人对其怀念景仰之深。

令之的《自悼诗》，已成为千古名句，被后人广为传诵和引用。“不因同里兼同姓，肯念先生苜蓿盘。”这是宋孝宗淳熙二年（公元1175年）进士、官至淮南西路安抚司参议、江苏高邮的陈造未仕时，在其《谢两知县送鹅酒洋面诗》中之句；“芋魁相送满筠笼，应念冰盘苜蓿空。”是明嘉靖时首相、江西铅山的费宏未官时，在其《谢姜宽送芋子》中的句子；清代四川西昌硕儒程允升，则把“苜蓿长阑干，奉师饮食之薄”的典故，列入《幼学故事琼林·师生》篇，用作童蒙读物。其流传范围，已不限于薛之故土乡里。

令之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，难免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他能够保持廉洁，不求厚禄，确属难能可贵。特别是提倡廉政的今天，重温一下这个故土人物生平，无疑地将会给人以启迪和思考。

《宁德地委党校校刊》83年第一期

## 薛令之及第的家族渊源和社会条件

缪品枚

### 一

薛令之及第的时间不管在神龙二年或元年（705 或 706年），都比林藻和欧阳詹进士及第的时间贞元七年和贞元八年要早85至86年，薛令之是开闽进士，断无争议。

再以史实标准衡量，做为以“诗赋取士”的唐代，考取进士，并非等闲之辈，他不会无诗、无传、无谱谍居里。所以“福州人薛全之”一说不攻自破。因为薛令之《新唐书》卷一九六有传（和贺知章合传），《唐诗纪事》有传，《闽中才子传》、《三山志》、《福宁府志》、《福安县志》皆有传；《全唐诗》有诗，《廉村薛氏宗谱》有谱谍传、赞；福安有三贤祠，灵岩寺、薛令之墓道碑等多处遗址。做为一方闻达，他是立体的。无传、无诗、无居籍后裔，作为“文章破八闽之荒”的开闽进士，而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一丝信息，这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。而且就此清人徐松在他所著的《登科记考》一书中，早就作了考门，他认为：“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引《登科记》神龙元年（及第）第五十四人有薛全之，按‘薛全之’即二年‘薛令之’之讹。所言五十四人，亦恐未足为据”。并进一步指出：“《淳熙三山志》、《玉芝堂谈会》皆载神龙元年，惟《三山志》注明丙午，则‘元’为二字之讹矣。”故结论是：“薛全之”史无其人。他只不过是令字讹误出的一个幻影。而“福州人”